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5

第15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5

第 15 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 15 辑 / 王铭铭主编.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 2010. 1

ISBN 978-7-5100-1796-4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人类学—文集 IV .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744 号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5 辑)

主 编: 王铭铭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责任编辑: 马春华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1-3086)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工业区 邮编 100162)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页 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ISBN 978-7-5100-1796-4/Z · 286

定 价: 36.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128246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马 戎(北京大学) | 范 可(南京大学) |
| 王东杰(四川大学) |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 |
|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 赵丙祥(中国政法大学) |
|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
| 邓正来(复旦大学) |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 |
|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 | 唐晓峰(北京大学) |
| 刘永华(厦门大学) | 徐新建(四川大学) |
|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 |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朱苏力(北京大学) | 郭于华(清华大学) |
| 朱晓阳(北京大学) |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 |
| 齐 琏(中国艺术研究院) |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 |
| 张江华(上海大学) | 萧 梅(上海音乐学院) |
| 张跃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 | 黄剑波(中国人民大学) |
|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 彭兆荣(厦门大学) |
|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 蓝达居(厦门大学) |
| 汪 晖(清华大学) | 潘 蛟(中央民族大学) |
| 周大鸣(中山大学) |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 |
|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 |

本辑主编助理

杨清媚 李金花 何贝莉 伍婷婷 罗 杨

目 录

超社会体系——对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思考	王铭铭	1
“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		
国族与世界体系		
“并接结构”中的“超社会体系”		
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文明作为“超社会体系”		
文明史、技术学与“超社会的社会”		
文明：“融合”同时是历史与价值		
附录：从《癫狂与文明》看通常的人类学观		

跨学科讲坛

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		
..... Michael Rowlands[文] 张帆 汤芸[译]	54	

追 忆

莫斯学术自述	Marcel Mauss[文] 罗杨[译] 赵丙祥[校]	66
--------------	------------------------------	----

学术讨论实录——“跨社会体系：

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研讨会

按语	78
主旨的简要说明	王铭铭 78
研讨概要	蒙养山人 81

圆桌会议实录

圆桌会议(一)	86
圆桌会议(二)	109

列维-斯特劳斯纪念笔会

列维-斯特劳斯留下的教诲	王铭铭	135
书还没有读完		
——为未曾谋面的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辞世而作	赵旭东	139
抛掉那面镜子——写在列维-斯特劳斯辞世一周后	赵丙祥	145
结构主义的“绝响”	梁永佳	148
列维-斯特劳斯的交响	杨婧	150
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 113 个词条	何贝莉	153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

我的中国史研究	James Hevia	180
---------	-------------	-----

读书会

在中国阅读杜蒙

按语	梁永佳	182
差异与等级——路易·杜蒙的比较社会学	梁永佳	184
读《等级人》导言及第二、三章	张亚辉	192
仪式即社会——读“Orokaiva 人的人观及仪式体系”	杨清媚	201
读“社会作为最终价值及社会—宇宙构型”	刘琪	207
读“莫斯、杜蒙及身份与权力的差别”	舒瑜	210

围绕利奇《上缅甸诸政治体制》一书的讨论

按语	郑少雄	212
“单一社会”的难题及其解决——再评《上缅甸诸政治体制》	郑少雄	213
也谈“如何批评利奇?”——他“最激烈的反对者”	夏希原	220
对“也谈‘如何批评利奇?’”一文的几点回应	郑少雄	238
对这一讨论的感想	夏希原	241

《树的社会生命》读书会纪要	舒瑜	244
---------------	----	-----

述 评

华西坝上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以《学思》杂志为例	李如东	249
-------------------------	-----	-----

书 评

《文化学概观》	陈序经著	温士贤评...276
《李济传》	岱 峻著	杨清媚评...284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李绍明口述 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李伟华评...290
《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	乔 健主编	李全平评...295

稿 约

超社会体系——对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思考

王铭铭

我一直使用“原始人”(primitive people)这个表达方式而对其概念未加进一步澄清。但愿我这样用词不会导致一种印象，不会让人以为，我们研究的人群是生活在卢梭想象的那种简朴而自然的原初状态中的。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是一个原始的民族，在其身后也有一部漫长的历史。一种可能是，这个原始民族可能曾经历过一个较高级的文明状态，后来因渐渐丧失其发明与思想，而又下降为一个较低级的状态；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从低向高攀登的过程比较缓慢，但却也确定无疑地是攀登到了目前这个水平了。然而，这种民族没有一个全然不受传统规定和规则的影响。相反，他们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越少，对决定他们的任何行动起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规定和规则，数量也就越多。^①

1889 年波亚士^②(Franz Boas, 1858—1942)在一篇题为“民族学研究的目的”的文章中如是说。

“断章取义”有悖阅读的目的，但这短短一段话，却实在已能使人窥见波亚士人类学之一斑——关于人类学家重点研究的“原始人”，波亚士有以下几点看法：

其一，“原始人”不是没有历史的“自然人”；

其二，“原始人”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文明阶段，只不过后来才“退化”为“原始”的，也可能发展太缓慢，花了太长时间才“抵达”现状；

其三，“原始人”不简单，他们比现代人规矩更多。

任何思考都难以尽善尽美。波亚士这段话里似乎藏着两种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不同“文明论”，一种视文明为文化的某种较高级水平，另一种视之为现代人的“自由”。两种模糊定义的“文明”之间有什么关系？波亚士对此未加解释。而

^① Franz Boas, “The Aims of Ethnology”, in *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George Stocking, jr.,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67~71.

^② 也译为“博厄斯”。

在后文中,波氏力推“民俗心理学”(folk-psychology),说这一学派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今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一个通常流行的观点,即“随着各地文明的进步,支配着个人的那些无数的规定与规则渐渐消失,个人也变得越来越自由”。^①人的“自由化”动力来自何处?波亚士又解释说,这不能完全将之归功于现代,而应求索古史,在“祖先”或“原始人”原本具备的“思维能力”里寻找答案。而“民族学研究的目的”一文旨在指出,“倘若我们用自己的感觉来确定我们的祖先如何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要期待自己会在研究上获得什么真实性结果,因为我们的祖先的感觉与思想和我们自己的不同”。^②

波亚士在以上三个看法中的第三点,构成对当时的人类学观的一种批评,它的意思是,不要以为那些规矩太多的“原始人”,比“自由的现代人”低级——他们在文化上达到的水平,固然可以说是较低级的,但民族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比较,“使自己沉浸于原始人的精神中”,从而使自己摆脱那些“决定着自己文化的根基部分的字眼自明的思考与感觉方式”^③……总之,民族学的比较,目的不在于说明“自由”相对于“规矩”的优越性,而在于通过“民俗心理学”来理解“原始人”规矩背后的情理自身,以及它与“我们的情理”之间的差异。

我们不仅要抓准波亚士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种重新定义过的人类学使命,而且也要看到,在这个“中心思想”之外,波亚士那段话的第二点,对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人类学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

波氏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致力于重新塑造美国人类学,这种人类学除了以上所说的“文化相对主义”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即赋予德国民族学传播论思想一种新解释。在这一新解释下,诸如威斯勒(Clark Wissler,1870—1947)、克虏伯(Alfred Kroeber,1876—1960)等对于作为文化分布的“自然地理区域”而非德式“文化圈”(Kulturregionen)的“文化区”(cultural areas)展开了深入研究。^④可以认为,“文化区”的研究,前提正是波亚士那段话的第二点隐含的观察——不存在全然独立于古代文明中心之外的“文化孤岛”。

可以认为,将“原始人”疏离在外,同时又将他们当作内部有繁复的复杂关系(由规矩表现出来)及外部有与其他文明的密切互动,这种做法,是人类学的传

^① Franz Boas, “The Aims of Ethnology”, in *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p. 69.

^② Ibid., p. 71.

^③ Ibid.

^④ Clark Wissler, ed., *Societies of the Plains Indians*, New York: AMS Press, 1975 [1912—1916]; Alfred Kroeber, *Cultural and Natural Area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

统。即使是在进化论时代,诸如被波亚士所反对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之类的人类学家,也一面将不同的社会形态当作孤立的、代表一定进化阶段的个案来研究,一面借助诸如语言学与考古学来探究它们之间在远古时代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① 在传播论人类学中,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则更有一种全然不同于“原始孤岛”的视野,关注全球范围的文化传播与组合,尤其关注移民、借用、模仿、学习、交流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活的文化”的号召的提出,集中于微小范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成为学科的规范。优秀的田野工作总是能包含着对文化之间交往关系的考察,但对于田野工作的观察力度与民族志的描述深度的新要求,却又迫使人类学家将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缩小被研究对象的“包围圈”上,人类学家为了使“活的文化”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上获得认可、取得独特地位,先验地把“整体”视作描述的前提,内外关系因素,至多只不过是作为“整体的转型”背景得到介绍,自身不被视作有理论意义的现象。

20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有一种自设的吊诡,它在某个局部,长期存在着有些人类学家诸如波亚士那样的“原始”与“文明”关系的论述,但从“总体形貌”上看,这门学科却走了另一条道路:它舍弃了19世纪对于学科论述至为关键的“文明”一词,也舍弃了曾为这门学科增添光彩的宏观视野与跨文化、跨社会关系研究成果,而将自身改造为一门“民族志科学”(其实所谓“民族志科学”,一般指的是对处于文明之外的“常人”的生活方式的深度描述)。依旧关注“原始”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学者,并非阙如,除了波亚士之外,尚有法国的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及另外一些以“民族学家”自称的学者;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个“民族志科学”的正统,似乎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当下,一派人类学家开始研究“原始人”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系,另一派人类学家借助历史学的方法,深入探究“原始人”的“对外开放”。

此处,我们将先阐述微观研究的局限性问题,而后,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宏观研究论,然后,揭示这些新式宏观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后,回归于20世纪前期,在对“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 systems)的有关论述中,追寻一种兼备认识论与价值论意义的宏观研究法。

此处的论述,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展开:

1. 解释沃尔夫(Eric Wolf, 1923—1999)所称的“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方法论后果,尤其是这一意象出现以后,英美及法国人类学先后出现的“巨变”,及其存在的问题。

^① Thomas Trautmann, *Lewis Henry Morgan and the Invention of Kinsh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 将人类学核心概念社会、文化,与国族概念谱系联系起来,指出其关联,并进入沃尔夫及沃尔夫之前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对于“世界体系”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这一“学派”的优点,但同时指出它的“理性一普遍主义”问题。

3. 解释对于“理性一普遍主义”的一种批判,如何导致一种文化学解释的复归,尤其是如何导致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有关“并接结构”及世界多元性观点的出现。

4. 指出,沃尔夫对于“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的批判意义重大,但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借用,则是有问题的;而对沃尔夫的批评所引出的萨林斯文化论,亦因过度关注文化内部结构对于外部关系的“涵盖”,而不能充分解释历史的“超社会体系”的根本特性。相比之下,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与莫斯有关“文明”与“国族”的看法,直面“超社会的社会”现象,对于我们的历史理解,帮助更大。

5. 指出,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中的文明论,尤其是莫斯创建的有关“文明”的民族学,已与社会学年鉴派的经典观点分道扬镳,不再注重神圣世界的“凝聚力”,而注重关系与融合,这才是文明人类学的要义。

诸种似乎并不符合 20 世纪初建立的人类学微观研究规范的宏观研究,间接或直接地触及“文明”这个被视作有民族中心主义偏见的现象。只不过是,其中,当代人类学家因生怕犯忌,而采纳更为隐晦的概念。所有几项将被具体论述的研究,都关注可谓是“超社会体系”的现象。我愿借用基于 20 世纪前期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的论述,将所有这些研究视作是“文明的人类学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civilization)。我能意识到,我的这一概括,属于“犯忌”之举:我们学科的同代人多数坚信,“文明”一词因有着鲜明的“民族中心主义”意涵,而不宜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发现者和宣扬者的人类学家之用。现代人类学对于“文明”概念的批判,固有其理由与力量,不过,出于对现代人类学自身局限性的思考,在行文中,我依旧将坚持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角度,述评现存研究。我将直面这个“文明禁忌”产生的学科历史,并基于对学科历史的重新思考(见附录),解释“拒绝文明”的人类学存在什么问题,“文明的人类学研究”有何可能。

“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

现代人类学由宏观研究转入微观研究,为了深化微观研究,创造出“超级微

观的世界界限”^①,使人类学丧失了其本来具有的“另一面”——对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地方之间关系纽带的关注。在一个时期中,美国人类学乡民社会(本身是由社会与共同体构成的复杂社会)研究、生态人类学与新进化论,部分地使关系的视野得到回潮,但已无法挽回人类学越来越受制于“自主、自制、自证的社会与文化概念”。^②

波亚士在民族学论述中继承了传播论的优点,但也正是他,在同文中埋下了“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的伏笔。19世纪末,波亚士已开始对“文明”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他在1889年所写的“民族学研究的目的”一文仍旧随意提及“文明”,但从德奥学术系统中的“民俗心理学”推衍出“相对严格”定义的“文化”概念,是其书写的目的。“文明”表达偏见,“文化”表达客观性,这个区分当时已形成。“文化”(包括有中心一边缘关系的“文化区”)之替代“文明”,实质是美国人类学中德式民族学(波亚士)之替代英式社会人类学(摩尔根),是德国文化论对于英法文明论的抵抗在美国的“本土化”。作为这一“学术观念替代运动”的领袖,波亚士的作为导致的“革新”确定无疑,其结果是:随着“文明”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中渐渐变成贬义词,它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销声匿迹了。

“把文明的历史远远地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儿懊丧吗?可是除懊丧以外你能指望什么呢?人生本是凄惨的,野蛮人相信险恶力量八方来袭,这实在比乐观主义的哲学家更接近于实际经验。文化是实际之一部,所以在文明的历史的每一页上人生的鬼脸都在瞪视我们。”^③波亚士的伙伴路威(Robert Heinrich Lowie,1883—1957,又译罗维)1929年即如是说。

区别于文明、外在于文明的“文化”,意象一旦确立,“孤岛”概念便随之诞生,因为,“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需在诸如“孤岛”这样的“意境”中方可得到证实。

在极力求知文化之间历史关系及异同的民族学中“去伪存真”,在美国导致文化人类学的出现,在英国导致社会人类学的出现。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消除文明论,转用“文化”概念,成为势所必然,其必然后果是关系的视野渐渐隐没,而在英国,对民族学进行重新定位以致革新,也于20世纪20年代成为潮流。

英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原在剑桥大学攻读民族学,1906—1908年到安达曼群岛进行考察。

^①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殊、杨玉静译,2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② 同上,26页。

^③ 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他自称,1908—1909年他着手写《安达曼岛人》^①一书,也像当时的民族学家那样,关注研究制度起源、文化史,更试图采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安达曼岛人的身体特征、语言和文化,由此,对安达曼岛人的历史及这个人群与整个印尼群岛、菲律宾等地的小黑人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探究。但是,写书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民族学家用来构拟未知历史的现有方法产生怀疑,认定这些方法无助于他得出可论证的结论。他渐渐醒悟到,推测的历史,不是理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好办法。为了一改民族学起源和历史研究的传统,他转向法国社会学,努力从中获得教益,用以对安达曼岛人的信仰和习俗进行解释。仪式和神话的“意义”和“功能”,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过去的民族学研究多满足于记录神话、描述仪式,并不关心其意义和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为了要一改民族学“不求甚解”的局面,拉德克利夫-布朗用了“导论”这个章节交代了安达曼岛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的一般面貌,接着,将全书的其他章节都奉献给了仪式和神话的“意义”与“功能”的研究。《安达曼岛人》这部著作,由此开创了结构—功能派民族志的新传统。

《安达曼岛人》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吊诡:它的“导论”呈现的,全然是这支族群与印度、阿拉伯世界、中国、近代欧洲等庞大政体之间的关系,借助的全然是这些外在的文明对安达曼岛人的记述,而它的核心章节,却并不是奠基于“导论”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而是峰回路转,采取一个非历史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分门别类,描述和分析了安达曼岛人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与巫术信仰、神话与传说等。“导论”中,自古以来存在的“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得到论述,而核心章节中,这些则如炎热天气下的水滴蒸发那样瞬间消失了。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人类学论点,严重依赖社会学,正是社会学的“社会”概念使他摆脱了美国人类学与传播论的无以根除的关系,而彻底根除了民族学关系论。

社会学率先将社会关系的领域从其他领域中分割出来,使它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地。社会学家独辟蹊径,“瞄准了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但又几乎从未加以研究的纽带”,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内部于社会的纽带,把人和人“联结成为群体和集团,或联结成社团的成员”。^② 在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后,社会学家对社会作了如此定义:(1)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可谓是“社会领域”; (2)社会秩序依赖于个人之间关系的生成与扩大,关系纽带

^① 该书原版于1922年,中文版见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8页。

的强度越大,范围越广,社会越有序;(3)关系纽带的形成与维护,与共同体中人的共同信仰、道德共识、习俗的存在与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4)社会关系的发展及相关信仰、习俗的传播,创造了一个社会,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这个整体本身会超越于人,使之形成凝聚力,但因其作为社会因素的信仰与习俗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并不作为道德共识存在,因而,社会并非没有边界。^①

作为近代的产物,社会学对于“社会”的定义,与西方近代政体的特征不谋而合,被凝聚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关系体概念,是与近代国家体制下“被治理的社会”的意象紧密联系着的。^②近代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强调了边界内的社会的“关系生成原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本注重人如何通过“集体表象”与物的世界构成关系,同时也关注信仰、习俗以及技术的传播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不过,因以涂尔干为首的社会学思想倡导者不断通过形而上学的论述强调社会学的独到价值——如,强调它是一门最有助于“道德共识”(人心)生成的学科,故渐渐舍弃了其本来拥有的广阔视野。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阵营(牛津大学人类学)是20世纪初一个局部的人类学“社会学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被他用来改造本学科的社会学,是一个对社会的边界给予过于清晰界定的“社会”概念。作为后果,20世纪人类学的主流成为“社会的人类学”(不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林诺夫斯基代表的更具德奥文化论色彩的“社会人类学”,这是一种更加社会学化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的一些局部,确以有创新的方式发挥了信仰、习俗的社会学研究中人与物关系的论点,但总体而论,“社会的人类学”,抛弃了它以前理论的世界眼光,如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那样,注重研究具体地点中的“活的文化”,他们研究的社会,与“活的文化”一样,没有历史,也没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类学则“深陷其自身定义的藩篱中”。^③

人类学中出现“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不乏有其历史偶然,不过,其成为20世纪前期以来一个大局部的“国际人类学”共同遵循的规范,却系历史必然。随着英语的进一步国际化,某种以新教“公正论”为基础、反偏见、反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的扩张,战后世界格局的改变,等等,是这一必然性的组成因素。^④尽管“暴力的结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⑤,但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出现与其所代表的国族时

^①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8~19页。

^② 同上,15页。

^③ 同上,26页。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Issue 5, 1997. pp. 1241~1257.

^⑤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3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代世界关系的吊诡，却常常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定位。美国“文化”与英国“社会”之成为西式人类学的主流，都可在二者的内外关系上获得解释，而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英美化”，也与之难脱干系。^①

20世纪前期，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已对英国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转而也影响到了美国的不少学者。然而，在当时法国社会学界，“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却没有替代宏观研究的迹象。法国社会学年鉴派一向珍惜英美学者所发表的微观民族志研究成果，但他们要么是因没有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要么是因对于宏大叙事更感兴趣，而自己却未曾致力于这类研究。与历史学、神话学、民族学界交流甚多的第二、三代学术领袖莫斯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更因深受其他学科的宏观视野的影响，而向来关注对民族志类的资料进行比较和综合的梳理。法国学界也活跃着另一类人类学家，凡·杰纳普（Van Gennep, 1873—1957）引领的一批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致力于对法国境内的广大地区展开二手文献、物质文化、神话传说、仪式等的大规模勘察。这些自称“民族学家”的法国学者，从德国“Volkskunde”（民俗学或民族学）中借用了宏观地区研究法，其研究虽受国家行政地理区划的局限，但在研究旨趣与取向上表现出了与传播论相近的特征。^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学术的分布特征。在法国，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已充分改变了中国社会学一个局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总体面貌的英美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致使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失去了其比较、综合与宏观区域研究的特征。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社会学中国学派”，50年代之后的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法”与英国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涌现了大量以微观细节的描述为特征的民族学研究，它们严重排挤了曾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研究课题，使之纷纷退出了学界的视野，让位于以村庄为单位的研究。即使是曾深受莫斯和葛兰言影响的杜蒙（Louis Dumont, 1911—1998），在法国社会研究中也鼓吹“社区研究法”，借之抨击过去的民族学研究。^③

^①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第一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② Christian Broomberger, "From the Large to the Small: Variations in the Scales and Objects of Analysis in the Recent History of the Ethnology of France", in *Tradition and Transmission: Current Trends in French Ethnology, the Relevance for India*, edited by Lotika Varadarajan and Denis Chevalier, New Dehl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3, pp. 1~42.

^③ Ibid., pp. 8~17.

国族与世界体系

人类学家或惯于使用文化概念,或惯于使用社会概念,两个“流派”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矛盾的。“文化的”人类学家说,在他们的概念体系里没有“社会”一词的位子,他们研究的“文化”,属于一地、一族共享的价值与道德体系;“社会的”人类学家则说,文化这个词太抽象以至轻浮,因内容空洞,而难以表达人类学家研究的那些可观察、可把握的具体事项,若说还能派什么用场,那充其量就是可用来表示“社会实在”的“表层”——“社会形式”。^① 不过,在两种人类学家眼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共同认可的。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应是可数的,不存在惟一的社会、惟一的文化,而这个可数的社会、可数的文化必然有范围限度。一个社会所指的东西,相对明确,任何一个不同层级的人群单位,都可谓是一个社会;但一个文化却不见得有此清晰的单位感,那么它所指的,便一般被等同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人群脑子里的那套观念体系了。人类学家常辩解说,他们未曾认为社会与文化是两相对应的。但他们的研究却表明,无论是将社会视作文化的实质,还是将文化视作群体生活的集体内涵,都是在将文化与社会对应起来。

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家不再如启蒙思想家那样将国族的好未来视作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使命,而反倒是对于这种在这个世纪到来之后不久便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因素——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些因素往往内在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或文化——心存深重的疑虑,但他们对“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的论述,却无一不是在重复着国族的历史。

国族概念的谱系学表明,历史上惟一将社会与文化对应看待的时代,就是开始于18世纪欧洲的国族时代^②,这种认为一个人群、一个社会必然和必须有其共同文化的观点,历史并不久远。而国族概念之荒诞,又恰好完全与社会和文化概念之荒诞一致。缘起于近代的国族主义,若是一个历史必然,那它与工业社会超越“面对面社会”(即所谓“社区”)的必要性是相关的。^③ 一个有效率的工业社会要求其人民普遍接受“普遍知识”的教育,因为只有经过“超地方知识”的陶冶,人

^① 库伯(Adam Kuper)对于美国人类学文化论者的批评,充分表现的这一分歧的特征,见 Adam Kuper,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民才可能成为国家工业机器的“螺丝钉”。“普遍知识”的传播，显然是国族时代教育的特征，但我们不应忘记，“普遍知识”恰又不可能局限于国族内部，而须是“普遍的”，且总是仰赖着所有国族的共同“积累”与相互“借用”。以集体意义上的“己”来重造社会，是所有近代国族自认的使命，但完成这个使命的办法，却又需要高度超越于“己”。这一内在于国族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总是在作为一种认同的国族观念的流动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表现：每个国族都在想象自己的进步中畅想如何变成一个不同于自己历史的未来，每个国族的自我认同，态度都“兼容并蓄”，既要求有自己的传统，又要求改变自己的传统^①，因而，这一认同，兼有“我群主义”与“他者为上”的双重性。加之，无论是欧洲、中南美洲、东南亚，国族主义的鼓吹者都深知，只有当他们说“别人的文化比我们的先进”时，国族主义的号召，才可能对他们的同胞有充分的感召力^②，因而，“以外论内”往往是国族话语之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集中对于国族概念的谱系学揭示，本已构成对于文化与社会这对概念的反思，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作为概念，都无疑像“国族”那样，是近代的发明。“文化”概念是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抵御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19世纪英法文明论而提出的^③，而英法“社会”概念，一面抑制限定着国族的外延，一面制造着某种普遍主义；而这对概念，无疑还是与国族概念一样，存在着阻碍认识达到其精确境界的问题。如同国族概念一样，社会和文化概念难以涵盖自身起源包含着的外在性。

与国族概念谱系学异曲同工，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以一种世界史叙述，对社会、文化、民族等概念导致的认识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

治世界史是否是治人类学？某些误认为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志的学者——如沃尔夫含蓄地指出的，这些人时常道貌岸然，以为自己是学科的卫道士，其实，他们恰是将学科推入“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之陷阱的罪人——不免会如此设问。但沃氏的旨趣却相反，恰是意在批判“以小见大”的民族志撰述方式。在他看来，被人类学家奉为信条、区分明确地理—精神边界的“文化”、“社会”、“制度”、“体系”之类概念所反映的，不是非西方世界的现实，而是西欧自身的民族分立观念本身。什么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非西方世界的现实？沃氏认为，这个现实是15世纪以来非西方部落、国家、帝国体系与区域性经济共同体为欧洲中心的政治经济

^①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dian Situation*, The Hague: Mouton, 1961.

^②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③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卷，王佩莉译，下卷，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99。